

敝刊在10月號出版了創刊三十周年紀念特號，從各方面均得到相當不俗的迴響，在此特別感謝讀者多年來的鼎力支持，你們的勉勵成為鞭策我們繼續向前奮進的動力泉源。

——編者

追問〈多餘的話〉背後的政治文化史邏輯

隨着1980年〈關於瞿秋白同志被捕問題的複查報告〉的發布，瞿秋白的「忠/奸」問題終於在官方層面有了結論。在此前近半個世紀的歷史時段中，對這位中共早期領導人及〈多餘的話〉的討論並不止於史實的重建，而是對瞿和他所關聯的一系列歷史事件的褒貶。可以說，對瞿本人的褒貶不僅關乎歷史，更事關當時的政治情境。

胡明輝〈瞿秋白《多餘的話》的政治文化史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20年10月號）一文，顯然注意到〈多餘的話〉背後的政治文化邏輯，胡文將對〈多餘的話〉的批判視為戚本禹「歷史陰謀論」的有意建構，並與1967年的「揪叛徒運動」相關聯：「從李秀成到瞿秋白，再轉至劉少奇，中共通過偽裝叛徒這種敘事方式，對歷史記錄進行微妙而激進的重塑，構成文革期間毛澤東所謂的『意識形態鬥爭』。」

在筆者看來，1960年代一系列對瞿秋白的批判或許並不能簡單視為「陰謀」或毛澤東本人「意識形態鬥爭」的結果，而

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

應從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不斷激進化的邏輯中思考變化背後的「存在之由，變遷之故」。王奇生曾以「高山滾石」比喻中國革命，在革命走向激進的同時，對革命者純潔性的要求也在不斷升高。因此，瞿秋白忠誠/背叛的問題或許可以放在一個更長時段的一系列事件中進行考察，如「潘漢年案」、「三十年代文藝黑線專政論」、「劉少奇案」、「六十一人案」等無一不是從對革命者純潔性的質疑開始，以對當事人「忠/奸」問題的審判為終。同時，對中國近代史上的「同路人」、「第三種人」等曖昧不清的「中間」地帶的敘述往往都指向了「忠/奸」的道德化判斷。所以，更需要追問的是，這些相似的歷史情境背後究竟共用了一套怎樣的革命與政治的邏輯。

雖然胡文注意到〈多餘的話〉背後的革命政治文化，但可惜最後僅僅將事件視為戚本禹的有意構陷和毛的意識形態鬥爭，沒有更進一步剖析〈多餘的話〉及系列事件反映了何種政治文化以及背後的思想線索，乃至於這種政治文化與中國當代政治生態之間的關聯。

殷鵬飛 北京
2020.10.25

國家主義論述的差異性

在〈中國特色國家主義——「天朝主義」文獻評述與脈絡分析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20年10月號）這篇頗具勇氣、容易引起爭議的文章中，桑河對王紹光、劉小楓、強世功等學者的國家主義著述進行了批評性的分析。作者把它們稱為「中國特色國家主義」，並打上了「天朝主義」的共同標籤。然而，文章不是要簡單地貼標籤，而是試圖建構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，來剖析這些「天朝主義」的政治主張、價值取向以及論述方法，並給予相應的批評。

這個分析框架包含三個部分的內容。第一是「反定型化」的政治主張。作者認為這些論者從不同的角度，為執政黨權力不受民主、憲法等制度化約束提供合法性辯護，或者掩蓋權力不受憲法制約的事實。第二是「差序格局」的反普世價值及精英主義立場。在作者看來，這些論述是以某種假設、價值觀為基礎的，即施特勞斯(Leo Strauss)學派闡釋的古典政治哲學主張：人天然是不平等的，精英與庸眾存在德性差別。這種觀點被論者用來為「中央—地方」的等級結構、執政黨的

優越性以及領導地位辯護。第三是「通三統」的方法論。作者認為這些論述都強調「儒、毛、鄧」三個傳統的連續性，運用了「通三統」的闡釋學方法，「論證儒、毛、鄧三統之間在政治上的一致性」。文章對於理解各種國家主義的共同點有一定啟發性，還具有促人反思的現實意義。但令人遺憾的是，文章仍然存在不少可商榷之處，尤其是該分析框架能否應對各種國家主義論述的差異性問題。

其中最明顯的問題是，王紹光、強世功等學者是否贊同精英主義的「德性差別」？儘管王紹光主張「政道」而拒絕單純以政體形式的民主與否作為政治合法性標準，但該主張不是出於精英主義，而是強調普通民眾的利益與平等。王對西方選舉民主批評甚多，其批評理由與「施派」截然不同，甚至相反。施派對選舉民主的批評在於：它抹殺了精英與庸眾在德性上的自然差別；而王的批評卻在於：選舉民主更多體現精英利益，無法真正代表普通民眾。因此，作者認為王的「政道」論述與「差序格局」進路的「德性之治」產生「交匯」，恐怕缺乏說服力。

同樣，從文章「差序格局」進路部分的引文來看，強世功為執政黨辯護時更多地訴諸執政黨的政治信仰、理念的神聖性或崇高性，而非執政黨員高於普通民眾的美德。強的論述似乎是從憲法的高級法視角展開，強調這些政治信仰與理念在社會價值觀體系中的崇高地位，不同於古典政治哲學強調精英與庸眾的德性差別。因此，強是否支持德性差別的觀點，恐怕也要打一個問號。

可見，這些國家主義論述存在着深刻而微妙的差別，論者的現實關懷也各不相同。在把這些論述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並給予批評前，作者應更深入理解它們的觀點及其差異。

文明超 廣州
2020.10.30

電影背後的風雲

目前學界對電影等非文獻資料的利用，除了將其作為文獻的旁證，大致有兩種取向：一種是立足於電影文本自身的解讀，以洞察隱藏其間的社會輿情與文化心態；另一種是聚焦於電影的生產過程以管窺背後的各類動向。張濟順的〈多舛之作：文革前夜周恩來與電影《李善子》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20年10月號）一文應屬後者，通過對《李善子》生產過程背後的政治運作之考察，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前周恩來與柯慶施、文藝界和上海電影人的關係，以及電影生產過程中的中朝關係變遷。

詳讀張文，筆者有以下感觸：首先，作為國際性和本土性雙重邏輯演繹下的電影史研究。張文將其考察對象置於全球冷戰的大背景中，發現周恩來通過指揮拍攝《李善子》這種文化交流的方式向朝鮮示好，以爭取這一反蘇鬥爭中的盟友；國內政治生態的演變亦造成「階級鬥爭」複調融入其中。正是在內爭、外交兩種力量的複雜互動之下，導致該影片從匆匆催生到「有疾而終」。

其次，實現電影史與革命史連接的有力嘗試。文革前國

內外局勢變幻莫測，各級政治人物亦根據自身位置作出不同研判，周恩來、柯慶施即是有力例證；而作者敏銳地抓住作為政治風向標的文藝領域進行切入，對複雜的政治演變剖析得入木三分。張文指出，除了「涉外」因素，「其中的癥結在於，周對眼前『文化革命』向『文化大革命』的『高歌猛進』，估計還是不足」，又引介「心靈史」的理念，對此階段周的心路歷程進行關照，並引申至對周在文革期間的評價，有力矯正了既有兩極化評論的偏失。

最後，凸顯作者的立意高遠與強烈的政治關懷。作者曾在前著《遠去的都市：1950年代的上海》中以「底層視角」來考察上海市民對電影業改造的因應，而作者在本文則反其道而行之，通過《李善子》一事來透視國內高層政治的波詭雲譎和國際共運中的翻雲覆雨；但其間一以貫之的是作為學者難能可貴的政治關懷。

當然，白璧亦有微瑕。筆者以為大致有二：其一，或囿於史料的有限，張文似乎未能考察到毛澤東在其間的態度，對周恩來與毛澤東、江青的互動似乏着墨；其次，張文呈現了兩條線的論述，即一條線論述內爭、外交造成文藝作品命運的跌宕起伏，另一條線考察周恩來在文革前的處境與心路。但在「結語」部分更多是對後者論述的引申。筆者以為，將其更名為「餘論」似更貼切。

程毅 上海
2020.11.18